



陶渊明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何世华

陶渊明这个杰出的作家，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他辞官归隐的意义，陶诗是否反映了时代的面貌和关于“桃花源”社会理想的评价等问题，意见不一，本文拟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有人说陶渊明的辞官归隐是消极的，是逃避现实。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

陶渊明早年抱着“大济苍生”的志愿，攻读六经，抚剑行游，想实现自己的壮志，所以曾几次进入官场。但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门阀士族统治的社会，政治异常黑暗，非士族的正直文人是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的。陶渊明经过作官——归田——再作官——再归田的几度反复，逐渐认清了当时的现实，所以在辞彭泽令回家之后，就坚决不肯出去再作官了。因此，陶渊明的辞官归隐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

（一）归隐是同当时士族大地主阶级不合作的表示，是对统治者的抗议。陶渊明的仕途生活，加深了他对黑暗社会的认识，也加强了他与当时把持政权的士族大地主阶级彻底决裂的决心，所以最后他认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①。”《归去来辞》就是他这一思想认识的总结，也是他和门阀士族统治决裂的宣言。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那些爬不上去而消极退隐的人，他是自动从统治集团中挣脱出来的。“不能为五斗米折腰”②，“宠非己荣，涅岂吾淄；捭兀穷庐，酣饮赋诗③”，都集中地反映出这种与统治者不合作的决心。关于归隐的原因，他自己是说得很清楚的：“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已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④。可见陶渊明的归隐，是由于他不满当时的现实，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他所以自比于伯夷、商山四皓和屈原，正说明他看不惯那个社会，而那个社会也容不了他。“世与我而相违”⑤，就正是最好的说明。

（二）辞官归隐，加深了他对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认识。陶渊明的一生都在积极地探索着出路，但是四处的碰壁不能不使得他产生“有志不获骋”⑥的苦闷。陶渊明在退隐之后，写了许多不满现实，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品，从许多方面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统治

者的残暴。他认为社会上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是非不分，贤愚不辨，“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毁誉”⑦；正直的人受尽压迫，而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爱国的屈原“逢世多疑”⑧，被排挤流放；有才能的贾谊“纤远譬于促界”⑨，无法驰骋；不好荣爵，不受厚饷的黔娄，连死时都“弊服仍不周”⑩；九十岁的荣启期“长饥至于老”⑪，过的是饥寒交迫的生活；王商因受谗免相，吐血而亡⑫；博学的董仲舒，由于怕受迫害而辞官⑬。他还认为统治者用人不当，赏罚不明。“结发从政”，战功卓著的李广，只能在受排挤和被误解中自刎而死⑭。这些残暴的统治者，对敢于向他们提出忠告的臣子，横加迫害，所以箕子只能佯狂为奴⑮。君主们“鸟尽废良弓”⑯，需要时就利用你，不需要时就把你干掉。在他的这些咏史的诗中，都注入了现实生活的感受。《感士不遇赋》更对三季以后的封建社会作了有力的否定，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阴森可怕、社会风气的败坏、人才的遭受压抑，以及没有是非、正义等不合理现象。因此，陶渊明对那些与统治者同流合污，趋膻逐臭的人，是极为鄙视的。

（三）归田使他参加了一些农村劳动，批判了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陶渊明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宁愿受穷受苦，甚至挨冻挨饿也在所不惜。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的归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出生后家道已经中落，没有富厚的资财来供自己享受，要活下去，不作官就非得亲自参加劳动不可。在艰苦的环境里，他没有动摇自己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地生活下去，“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⑰，他的意志是何等的坚定！陶渊明归田后，是亲身参加了农村劳动的，这在当时的文人中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封建社会和儒家思想本是鄙视劳动的，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地主更是如此。在“士大夫耻涉农务”⑱，祖先担过粪都要被别人骂为“尚有余臭”⑲的社会风气中，陶渊明能突破一定的阶级偏见，坚决走上躬耕的道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⑳，“贫居依稼穡，戮力东林隈”㉑，这是很简单的事。他虽然还不能和农民相比，但毕竟亲自参加了一定程度的农业劳动。在这个过程中，他进一步体会到劳动的重要：“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㉒，“衣食须当纪，力耕不吾欺”㉓；并进而批判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舜既躬耕，禹亦稼穡”，“冀缺携俜，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陇亩；矧伊众庶，曳裾拱手！”㉔。对那些“曳裾拱手”的人，公开进行了谴责。

（四）借歌颂农村田园生活，批判了官场的黑暗腐朽。陶渊明的归隐是对腐朽污浊的官场的否定。他说：“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㉕，把污浊的官场叫做“尘网”，叫做“樊笼”。他的有些作品表现了一种从溷浊的政治漩涡中脱身出来，回到朴素淳厚的农村的清新感觉。很自然，园林的景色，农村的生活，农民的浑厚感情，这一切和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官场比较起来，是截然不同的。因之，他赞美它，甚至不自觉地带着一些故意夸大的成分来歌颂它。这种对农村田园生活的赞美，反过来就是对官场的批判与否定。在归田的初期，陶渊明竭力描绘田园生活的快乐，把农村田园写得很有生趣，极富于吸引力：“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㉖。“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㉗。在和朋友的赠答诗中，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农村的田园生活，希望别人同他一道退出官场，隐居田园，不为统治者作事。应该说这是一种反抗现实的表现。

自然，由于陶渊明的生活经历有限，他一生只作到县令、参军之类的小官，归田后他的

足迹更没有出过百里，对上层统治者的生活缺乏直接观察，因而在他的作品中暴露市朝显达的罪恶是显得不够具体的。加之当时文人动辄得咎，没有什么“艺术民主”，陶渊明为了避祸，写东西常常隐晦其辞，不敢大胆直说，这些都影响了他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深度和广度。在他身上还具有一种小有产者安于现状的生活情趣，如果逢着什么“念之心中焦”的事，他就“浊酒且自陶”一下，在无可奈何中去寻求自我安慰和麻醉了，而这又是和当时流行的老庄思想有关系的。

一

有人说：陶渊明所处的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代，而在陶诗中却没有反映出时代的面貌，哪怕是其中的一方面；他把灾难深重的农村描写得那样恬静、舒适，这就掩盖了农村阶级压迫的本质。我们认为，这个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看来，陶渊明早年并未参加农业劳动，因此在他心目中的农村生活，最早还只是偏于恬静、舒适的一面。在弃官归隐的初期，因为他要突出厌恶官场、热爱农村生活的思想，也把农村写得有点过于恬美静穆。这虽然有其主观的片面性，但我们应该看到作者不满官场的苦心。当陶渊明真正深入农村，备尝艰苦饥寒之后，情况就不同了。辞官归隐的头几年，他本来认为“力耕不吾欺”^⑳，劳动可以自养的，但他的生活却和一般农民一样，不断地走着下坡路。加以屡经丧事，又遭火灾，生活的确是一天不如一天。他住的“不蔽风雨”，穿的“短褐穿结”^㉑，不只“瓶无储粟”^㉒，而且常常“簞瓢屡空”^㉓，这些都促使他对农村的凄凉凋敝景象和农民的痛苦生活逐渐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里，他写道：“炎火屡焚如，螟蛾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旱灾、虫灾、风灾、水灾等使得收成极坏，饥寒逼得人坐卧不安，夜晚盼天亮，天亮了又嫌太阳走得太慢。这是陶渊明自己的情景，同时不也是反映出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的悲惨生活吗？陶渊明后期的作品，有许多描写了个人生活的饥寒交迫景况，如“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已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㉔诗人的生活要求并无过分的地方，但就是这样低微的要求，在当时还得不到满足，怎能不使他感到“哀哉亦可伤”呢？“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羨，孰敢慕甘肥！怒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㉕；“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㉖。这些都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现实是多么无情地折磨着他。这虽然是写他自己悲苦的生活，但也衬托出当时比陶渊明更苦的劳动人民生活的状况。另外，陶诗中直接反映农民生活的痛苦和农村经济凋敝的也不少，如“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㉗；“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㉘。农村的日趋贫困，当然是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造成的。《宋书·武帝纪》说：“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陶渊明后期写了相当数量的啼饥号寒、悲愤不平的诗歌，象《戊申岁六月遇火》、《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杂诗》、《丙辰岁八月中于下巽田舍获》、《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咏贫士》、《有会而作》、《乞食》等，通过个人的遭遇和感受，显示了农村破产、农民

痛苦的凄惨景象，如果不把阶级矛盾理解得太狭窄，应该说这些作品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的。

在《还旧居》中，诗人写他回到故居所见到的一切，与六年前景况大不相同，于是带着沉痛的心情去回忆过去，从而发出哀叹的声音。人们不禁要问：仅仅六年时间，为什么他的故居竟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去研究当时的历史环境了。东晋时代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特别是陶渊明的家乡浔阳一带曾发生了好几次军阀战争。先是桓玄迁帝于浔阳，然后是刘裕起兵讨桓玄，浔阳即被刘裕部下占领，接着是桓玄故将袭破浔阳城，最后是刘裕派人讨平之^⑳。而陶渊明回到家乡恰是战后不久。因此，《还旧居》所表现的那种“恻怆多所悲”的变化，恐怕主要就是桓、刘战争对陶渊明家乡浔阳一带的破坏情况的反映。应该说是黑暗统治下的经受了军阀战争破坏的农村景象的描写。

至于当时的民族矛盾，陶诗中虽然反映得较少，但也并不是象有的人所说，一点民族矛盾的影子都没有。

东晋义熙十三年，刘裕率军北伐后秦，破长安，灭姚弘，驻军关中。左将军朱龄石遣长史羊松龄赴关中称贺。陶渊明在听到这一消息后，心灵受到震动，最初进入诗人意识的是：祖先辛勤劳动所创造保留下来的遗迹，以前由于南北分裂的缘故不能前往，现在中原恢复了，可有机会去亲自探访了：“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诗人对政治是敏感的，虽然对河山的收复表示高兴，却也看到统治阶级中矛盾重重，认识到胜利是不可能持久的，因而托言“负疴不获俱”，终究是不能前往的。“请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这种阴暗的心情，正是当时的现实造成的。刘裕进行的这次北伐，虽然得到成功，但为了满足自己篡晋的政治野心，终于退师。刘裕的必然篡晋，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面对这一事实，诗人有“商山”、“黄绮”的思想，就不足为奇了^㉑。

陶渊明在晚年，对这次北伐仍念念于怀。他在《述酒》诗中写道：“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双甫云育，三趾显奇文。”当追叙晋室南迁时，他深感中原沦于胡羯，指出关洛平定，人民始可长育，但又慨叹民族旧耻虽雪，而篡弑之局已成。其中关怀中原土地和人民的心情与《赠羊长史》诗是一致的。在《拟古》其二，陶渊明对田畴这样一个富于爱国热情的人物的倾心，也是出自同一心情。诗中流露出虽然中原不能恢复，但一往访问一下结“坞”自保，抵抗外族侵略的田畴这样的人也是好的。这种想法是浪漫的，也是现实的。其中闪烁着理想的火花，也蕴藏了现实的血泪。对比田畴，刘裕这种以恢复中原为自己篡夺资本的人，真可以说是“狂驰子”了。在《詠荆轲》中，诗人所表现的对荆轲爱国热情的倾慕，也是和上述的爱国精神相通的。因此，说在陶诗中“没有反映出时代的面貌”，这是不够妥当的。

有些人把陶渊明的爱国精神说成是对晋室的效忠，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自沈约《宋书》“耻复屈身异代”之说提出来后，历代颇多附和。我们综观陶诗，觉得忠于晋室的说法不能成立。正如清马璞所说：“渊明念念黄农，即宋不篡晋而终身晋世，岂能为晋所用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其胸中何尝有晋”^㉒。陶渊明的归田不仕距晋亡尚有十五年，怎么能简单地用忠于晋室来解释呢？沈约《宋书》还认为陶渊明“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陶渊明的诗文并未“皆题年月”，相反，却是绝大部分都未题年月，而题年月的一小部分

皆“惟云甲子”，却没有“书晋氏年号”的。

三

关于“桃花源”的社会理想，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在过去的讨论中，就有人说《桃花源诗并记》是反动的作品。而否定得最彻底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错误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文章说：“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文章还把陶渊明关于“桃花源”的社会理想，同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假共产主义混为一谈。这就彻底否定了“桃花源”社会理想的进步意义。

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是他在参加了辛勤的劳动之后，饱尝了艰苦饥寒生活的晚年时期的作品。陶渊明的后期经常受到饥寒的威胁，亲眼看到农村的凄凉凋敝景象，这就促使他不能不去寻求农村贫困的原因了。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发展，才推动他提出了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桃花源”的社会理想，从而对不合理的社会表示了抗议。

“桃花源”的社会理想是受到了传统思想的影响的，这一点无容否认。因为关于远古的社会传说，在各家的学说中都是有所记载的。例如，道家有《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素朴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儒家有《礼记·礼运》的大同世界；法家有《商君书·画策》的“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和《韩非子·五蠹》的“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的描绘。这些都是原始社会的情景，通过各家的政治需要改造制作出来的。不过，各家都未曾提到这样的社会没有统治者的君王。魏晋间的阮籍在《大人先生传》里提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稍后，鲍敬言的《无君论》更提出“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这些都是陶渊明的“桃花源”社理想所吸取的思想资料，但更重要的是当时苦难的现实对作者的影响。因为意识是存在的反映，实践是认识的根本来源，决定作家的思想的是他的社会实践。陶渊明的出入官场、退隐躬耕等特有的生活经历和当时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是形成他的思想的主要根据。在那个时代，人民大众“逃税避难”的灾难现实对作者的启发是很大的。《三国志·魏志·田畴传》载：田畴“遂入徐无山中，……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艺文类聚》九一引《晋中兴书》说：“中原丧乱，乡人遂共推郗鉴为主，与千余家俱避于鲁国峯山”；《太平御览》四二引《地理志》说：“峯山在邹县北，……永嘉中太尉郗鉴将乡曲逃此山”；《晋书·庾袞传》载：“袞乃率及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这些堡坞式的东西就是“桃花源”的生活影子，但“桃花源”这种完全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世界，又和以地主统治为中心的堡坞有本质的不同，它还杂揉了如《赠羊长史》诗中所说，由征西将佐归来后所谈西北人民逃避苻秦暴虐的情况。这说明“桃花源”不是作者的凭空虚拟，但又不是现实主义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描写，而是根据一定的思想观点和理想，浪漫主义地改造了现实素材创作出来的。

在《桃花源诗并记》中，作者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表示不满，怀恋着在他的诗集中所一再描绘的黄、虞、羲、农之世，并按照自己的理想，创造了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无阶级剥削的社

会。虽然这是一种幻想，但在这幻想中却反映了人民摆脱灾难的愿望和要求，反映了人民在阶级社会中迸发出来的美好理想。对理想社会的歌颂和肯定，正是对现实社会的诅咒和否定，所以这种理想应该是反封建压迫和剥削的集中表现。在我国古代，虽然有些人对封建统治表示愤恨，对农民的痛苦生活表示同情，但一涉及到用怎样的社会制度来代替这个罪恶的现实时，他们还不可能象陶渊明这样提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大家劳动、和平幸福的社会理想来。这里面虽贯穿着小生产者要求平等的思想，但正如列宁同志所指出的：“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④。作品中的“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嬴氏乱天纪”等，更是明显地对当时现实社会的否定。“靡王税”的社会理想，并不仅仅是作者个人对生活的希求，而在当时长期的兵荒马乱的黑暗年代里，是有其较大的进步意义的。一方面，它反映了人民在长期战乱和残酷剥削中所形成的反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它认为君主是剥削压迫的不幸之源，人民反抗官僚政治制度是合理的。这在客观上便具有号召人民为反对现存制度而斗争的积极作用。在封建社会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④，谁敢触犯这样的教条那就是“大逆不道”。而陶渊明竟公然喊出“秋熟靡王税”，喊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是相当大胆的行为。所以陶渊明提出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是对统治者的公开挑战！

有比较才能鉴别。“桃花源”理想的出现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只要把它同东晋人张湛在《列子·汤问》里所描绘的“终北国”一比，就看出高下来了。“终北国”和“桃花源”都反映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向往，都主张没有君臣、没有争夺、没有痛苦。“桃花源”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而“终北国”却是“不耕不稼”，“不织不衣”，人人都信天赐的“神羹”作为生活资料。在“桃花源”里人人劳动，年年耕作，“往来种作，……悉如外人”；而“终北国”的人却什么也不干，终年歌唱、游玩、饮酒、睡觉。显然，“终北国”里那种不劳而获的懒汉哲学，正是魏晋时代士族地主追求享乐的腐朽没落的阶级意识的反映。当然，“桃花源”这个理想社会也是有很大的弱点和局限性的。这是因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

“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于纯粹的幻想。”但是，“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们所看不见的”④。陶渊明生活在一千五百多年前，那时既没有资产阶级，更没有无产阶级，难道“桃花源”式的小生产者的理想不是当时最有进步性的理想吗？我们怎么可以反历史主义地把它同假共产主义混为一谈呢？

有人说《桃花源诗并记》是复古主义的东西，是开倒车的，是使历史回到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天地中去的。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不对。我们应该看到，颂古非今正是封建时代的文人反抗现实的一种手段。“颂古”的目的实际上是要“非今”，是要否定现实。何况陶渊明的“桃花源”和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是不同的。老子主张愚民、复古，不要器械、舟车、文字，使人类永远停留在极低的水平上，是落后的，倒退的。而在陶渊明的“桃花源”里，却洋溢着快乐、幸福的气息。这里环境非常优美，人与人的关系亲密无间，人人都努力劳动，没有残酷的掠夺，也没有欺诈和压迫。它会激起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引导人们向前看，而不是象老子的“小国寡民”那样引导人们向后看。当然，陶渊明的乐天安命，人生无常等思想，应予批判，则是不言而喻的。

注:

- ①⑤⑩《归去来兮辞》。
②《宋书·陶潜传》。
③《自祭文》。
④⑨⑫⑬⑭《感士不遇赋》。
⑥⑳《杂诗》。
⑦⑪《饮酒》。
⑧⑮⑯《读史述九章》。
⑩⑰⑳《咏贫士》。
⑪颜之推:《颜氏家训》。
⑫《南史·到溉传》。
⑬⑭《归园田居》。
⑮《丙辰岁八月中于下巽田舍获》。
⑯⑰《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⑱⑲《移居》。
⑳《劝农》。
㉑《读山海经》。
㉒《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㉓⑳《五柳先生传》。
㉔㉕《有会而作》。
㉖《资治通鉴》卷一一〇、一一三。
㉗《赠羊长史》。
㉘《陶诗本义》卷四。
㉙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㉚《诗经·小雅·北山》。
㉛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也谈产生共同美感与共鸣的原因

张伯龄

能引起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的共同美感与共鸣的根本原因是人的共性。因为人类作为宇宙万物的一个总类别,是具有一些共同的心愿、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感情的。如主持正义,追求光明,热爱祖国,希望和平,向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酷爱生命,渴望爱情,远行思乡,久别怀亲,爱美之心,骨肉之情……这些都是任何阶级的人都共有的。如果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反映了这一类思想感情,那末,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不同阶级的人读了,就有可能被触动而引起共鸣。虽然人们对其具体内容的解释、理解、抒发、欣赏各不相同,但在“追求”“热爱”“希望”“向往”“渴望”等感情上则是一致的。十九世纪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句就越过时代、越为国界,为不同阶级的人所倾倒,鼓舞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为反抗压迫、争取民主而斗争。我国古代杜甫和陆游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等诗句,就因为表现了人们普遍具有的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才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中产生那么大的魅力。而李白和王维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等诗句,也正是由于表现了人们普遍存在的眷恋乡土、怀念骨肉的思想感情,才自然而然地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客居他乡或分居异地的人心中激起共鸣。